

(日) 西田龙雄著¹；景永时²，鲁忠慧³译

(1. 日本京都大学，日本 京都；2. 北方民族大学，银川 750021；3. 宁夏社会科学院，银川 750021)

关于西夏语翻译的《法华经》^①

【关键词】西夏；《法华经》；语法；文体

【摘要】依据西夏文《法华经》，对西夏语的语法、文体等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西夏语是以党项（弥）族的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西夏文体分单纯文体和复杂文体，而《法华经》是后者的代表。《法华经》是12世纪中期的译本，它是汉译本的忠实翻译，但不是直译，而是在深刻理解原意的基础上的意译。《法华经》的译语可暂时作为标准体之一。

【中图分类号】K246.3；G256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5—8214(2009)02—0098—05

1 西夏语的研究与《法华经》

众所周知，毛利瑟（M. G. Moriss）的西夏语语法的研究《西夏文字与西夏语研究初探》对20世纪初期的西夏语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毛利瑟在北京得到了《法华经》卷五，这是非常漂亮的绀纸金泥写本。看到近代人整理的西夏文资料是居庸关石刻，而最早接触到的经典即《法华经》。1909年科兹洛夫在黑城挖掘到了大量的西夏文文献，这意味着《法华经》的发现在西夏语的研究历史进程中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事情。西夏文《法华经》研究，虽然有罗福成的研究成果《西夏翻译的莲华经考》于1914年在京都刊行，但此后却再没有出现过得值得注目的研究成果。这部经典的西夏文译本与汉译本对照、比较的话，较难解读，也就是说与其他经典相比，西夏文的《法华经》更加难以理解，因为其中存在着不好分析的语法现象。所幸的是，现在随着其中困难的不断解决，重新从事这部资料的研究成为可能。毛利瑟的旧藏本《法华经》分别藏于现在德国柏林的国家图书馆（卷一、三、四、

五、七）和法国巴黎的集美博物馆（卷二、六、八）。

2 西夏文字的创制与西夏书面语的设定

学术界周知，西夏文字颁布于1036年，这一事实在中国史书《宋史·夏国传》中就有记载。我以为值得一说的是与此同时的西夏书面语。

开国皇帝李元昊于1036年颁布西夏文字以后，以西夏文字代替之前的汉字书写西夏文书。首先，把西夏语作为西夏国的公用语言，这就应该理解是为了西夏书面语的表达，已经创作了代替汉字的西夏文字。这是很重要的变化，因为与其说是新文字的诞生，还不如说是新书面语的诞生。

西夏语书面语究竟是以什么作为基础形成的呢，又以什么作为标准体的呢，这不是一个很容易能得出结论的课题。我认为西夏文字恐怕是以被收录于《同音》（或者原型）体系的字书的字形作为标准体的。起初我以为西夏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因为境内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所以超越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创造出了表现有意义单位的表意文字而派生出的一种语言。在我更深地了解了西夏语的实际情况之后，才知道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原来西夏语是以西夏国的主体民族的弥族以及木雅人的口语形式作为基础的书面语。

最重要的依据是分别使用的平声字和上声字。从声调的对立关系对西夏书面语的拼写方法起到很大作用这一情况，就能推定其书面语是把口语作为基础形成的。

在此，简略地叙述一下平声字与上声字在不同条件下分开使用的情况。

𐵇 s'i (平) 和 𐵇 s'i (上) 疑问代名词 谁
WrT su

𐵇 thaŋ (平) 和 𐵇 thaŋ (上) 指示代名词 那个
WrT de

① 原文发表在2002年《东洋学术研究》第41卷第2号。

这两个词的平声字承担着主格、上声字承担着间接格的功能。这与藏缅语中所见到的功能完全对应的(比如缅甸语^①)承担某种语法不同功能非常相似的字形文字,我称之为双生字。1997年在沈阳召开的日中共同文字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就这样提出过。^②在西夏文字中,意思、功能上有密切关联的双生字为数不少,复双生字(4个子字)也出现了,也有声调对立却承担名词和动词功能对立的双生字。

ex. 𐰚 'yi (平) 谓: 𐰚 'yi (上)、𐰚 ki (平) 鞋: 𐰚 ki (上) 穿鞋 𐰚 nd'ur (平) 敌: 𐰚 nd'ur (上)、𐰚 zu (平) 枷: 𐰚 zu (上) 上枷锁等,处于固有语和借用语关系的夏汉双生字也有不少。

ex. 𐰚 nd'ufi (平) 知道: 𐰚 tsi (上) 知道 (汉语)

声调的对立同时也在 𐰚 nd'ofi (平) '蛇之毒'和 𐰚 nd'ofi (上) '草之毒'这种意思不同时起作用。在《法华经》中都使用了后者的文字。

3 佛典的翻译——单纯文体与复杂文体

在西夏语公布的同时,考虑到西夏书面语,不久,李元昊开始进行佛典的翻译。此书面语是在以后200多年间被推敲出来的,它对佛典和中国古典的翻译有很大贡献。现在翻阅残存下来的西夏文献的话,其文体形形色色,很难判断哪一个是标准文体。我大概将其分为两类,方便起见称之为单纯文体和复杂文体。《华严经》是前者的代表,《法华经》是后者的代表。

4 西夏语翻译的《法华经》序文

西夏翻译的《法华经》现存两种序文。一是毛利瑟本的《妙法莲华经》弘传序,这不是宋版汉文序的直译,大体上是忠实的意译。一是科兹洛夫本的序,这是西夏人的独创文。除此之外,还有河西本《法华经》(汉文),此经没有翻译成西夏语。

从科兹洛夫本的序中可以判明以下几点:

(1) 凤角城皇帝(李元昊)时期创造了西夏文字,翻译了大量的经典。

(2) 最初翻译的经典中不包括《法华经》。

(3) 属于下一个阶段翻译经典的事业。

(4) 现在的圣母子继承王位,发愿信佛法。

(5) 不久印刷一部,在国内颁行。

在序文中有以下的叙述:

“今日的圣母子”大概指的是惠宗及皇太后梁氏,科兹洛夫本的刊本(卷一至卷八)开头中与译者名一致。皇太后梁氏1085年去世,所以,可以认为这部《法华经》大概是在11世纪中期1068年—1085年间翻译成西夏文的。^③科兹洛夫本的写本(卷六)中,因为是仁宗时校订的,此写本还会晚一些,大概在12世纪中期。

现存西夏翻译的《法华经》,毛利瑟本和科兹洛夫本都是从鸠摩罗什的汉译《妙法莲华经》重新翻译过来的,不是《添品妙法莲华经》的译本。^④

5 原文对照校订与毛利瑟本的特征

今后的西夏佛典研究首先应该进行原文对照、校订工作。对于《法华经》,应该详细地比较对照科兹洛夫本和毛利瑟本。毛利瑟本确定是后代的书写本,因为不允许复印,所以,不得已放弃了这些工作。但是从我以前调查的笔记中我明白了至少在陀罗尼的音写方法上,存在着很大差异。

以下通过若干个示例,来说明其特征。

毛利瑟本在反映西夏语自身音变化的同时,贴近梵语音(恐怕参照了藏僧侣的读音),应该是在整体的音写方法上下了工夫。

(1) skt.dhāraṇī 陀罗尼

科兹洛夫本 𐰚 𐰚 𐰚 thonl'ofi

毛利瑟本 𐰚 𐰚 𐰚 ndafi 長 rarnifi

科兹洛夫本的形在很多的经典中都是固定译语,而毛利瑟本的形给予了长母音的指示。

(2) skt.dharma 达磨

科兹洛夫本 𐰚 𐰚 thaḥmofi

毛利瑟本 𐰚 𐰚 ndaḥfirmafi

科兹洛夫本的形在禅籍中已经是固定译语,而毛利瑟本的形插入了-r-指示一字。

(3) 毛利瑟本中,梵语的末尾子音-, -n, -k 就是明确表示西夏文的一个字。当时西夏语的音节全都是

①参照西田龙雄《西夏文字新考》,载《东方学论集》,东方学会编,1997年出版。

②拙论《西夏文字的特征——其文字组织的研究》,载《日中合作文字文化研讨会发表论文集》,文字文化研究所·辽宁博物馆,1998。

③中国西夏学者史金波教授认为此《法华经》成书年代为1049年—1069年即第二代皇帝毅宗时期(《西夏佛教史略》1988),我以为现存的版本明示的(卷2—卷6)是大明皇帝=惠宗,第三代皇帝惠宗及母皇太后梁氏时期,大概是1068年—1085年。

④关于西夏语的佛典,参照西田龙雄《西夏语佛典目录编纂上的问题》。Katalog Tangutskikh Buddhiiskikh Pamyatnikov, E. I. Kychanov (京都大学文学部语言研究室刊,1999)绪论。

以母音结束,末尾子音消失是由于先行母音鼻母音化了,特别是以增添一字,明确表示末尾子音。

科兹洛夫本		毛利瑟本
羶 shan	𣎵 sīan	羶 𣎵 sīa-ni
僧 sam (gha)	𣎵 sən	𣎵 𣎵 sah-ŋ ^u ufi
目 muk	𣎵 mbow	𣎵 𣎵 mu-ki

(4) 梵语的两重子音 khs-, 汉字的音写是一字 tsh 或者是 kh, 科兹洛夫本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而毛利瑟本接近于原音, 相当于两个字。

科兹洛夫本		毛利瑟本
khṣa 叉	𣎵 tsha	𣎵 𣎵 khi-sīa
khṣi 耆	𣎵 khifi	𣎵 𣎵 khi-si

梵语里的 tr-, 毛利瑟本中用 𣎵 𣎵 tirar。毛利瑟本的音写法与《金光明最胜王经》和元代居庸关石刻的音写法几乎是一致的, 这反映出某个时期西夏语翻译经典的工作, 为了更加正确地标记出梵语音所进行的一种革新。

汉译者鸠摩罗什的名字, 科兹洛夫本和毛利瑟本中都是 𣎵 𣎵 𣎵 𣎵 kīawmōfīlōshir, 毛利瑟本序、《妙法莲华经》弘传序(唐终南山道宣述)中, 是 𣎵 𣎵 𣎵 𣎵 kīafmāfīlāshīlā。

6 西夏语翻译的《法华经》译文

《法华经》的西夏文, 虽然是汉译本的忠实翻译, 但不是直译, 是在深刻理解了内容的基础上的很好的意译。认真阅读的话, 会发现汉文与译文之间存在很多的不同的点。比如, 卷六的如来寿量品(16)中, 汉文仅仅 4 个字“道利众生”, 所对应的西夏译文就有 12 个字之多。

B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将诸众生引向道教, 造就利益, 我

“道”与“利”分别翻译为两个音节单词的“道教”与“利益”, 主动词“造”在 B 语干形式下, 是伴随第一人称代名词接词的行为者视点文(后叙)。这样的文章经常使用复杂文体。动词语干是两种接头词先行, 其中之一或许就是衍字。^① 另外, 卷二中的譬喻品(3), 把“生受楚毒 死被瓦石”翻译为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𣎵, 一共四语两句, 是西夏文脱离了原文的表现, 但是西夏文更容易理解。同是二卷中

“或时致死”被直译为 𣎵 𣎵 𣎵 𣎵, 除此之外, 也可以考虑译为 𣎵 𣎵 𣎵 𣎵。

7 佛教用语的西夏语翻译

西夏的佛教用语研究还不够, 应该说是刚刚开始。没有编辑《翻译名义集》类书。汉语的直译语和意译语占了主流, 藏语的直译语和意译语是作为补充的。国有的翻译所虽然存在, 似乎还没尝试过对译语的统一, 所以, “世尊”一词在汉译本重译本中, 用的是 𣎵 𣎵, 藏文的译本中用的是 𣎵 𣎵 𣎵 (坏有渡 bcom-idan-hdas), “比丘”相对 𣎵 𣎵 (phifkhīaw), 使用了 𣎵 𣎵 (善起 dge-slong), 从翻译语就能判别出原来的语言(是汉语还是藏语)。即便是来自汉文的译本, 也绝不会使用统一的译语。就拿刚刚作为示例的“比丘”, 在《佛本行集经》等中用的是 𣎵 𣎵 phifhtsīuz, 这反映了汉语的“比丘”读法的不同。另外“夜叉”skt.yakṣa 在《法华经》中是 𣎵 𣎵 iakhafi, 《华严经》中是 𣎵 𣎵 iatsha。(《佛本行集经》中为 𣎵 𣎵 rarkhafi, 另外“罗刹”skt.rākṣasa, 在《佛本行集经》音写为 𣎵 𣎵 rarkhafi, 而《法华经》中为 𣎵 𣎵 lōfhtshā。)另一方面, 像如来 𣎵 𣎵 这样来自藏语直译语一般作为固定译语, 来自汉译的重译本中也常用。这是置换了藏语旧译 yang-dag gsheg-pa。^② 虽然还有很多研讨的必要, 我想是否可以把《法华经》的译语暂时作为标准体之一呢?

8 一般语汇与佛教用语的判别

经典的翻译, 内容上是很难的教义, 表述方面因为考虑到要让一般人能充分理解, 所以, 《法华经》中一定也多少加入了口语形式, 而如何辨别又是个问题。我以为特别是《蕃汉合时掌中珠》所使用的语汇基本上都是口头语。从《同音》的形来看, 是一般的通用语, 与此是否吻合可以作为一种标准。例如, “懈怠”(skt.kausidya)一词, 《法华经》卷四(8)中就有“虽小欲懈怠”的使用实例, 西夏文把其翻译为 𣎵 𣎵 𣎵 𣎵, 最后的两个字 lon-īe, 相当于懈怠。除此之外还有几处, 比如在序品中也使用了相同的词语, 在《七佛八菩萨陀罗尼经》的经典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语形。但在《大宝积经》中使用了与此不同的 𣎵 𣎵 lonlⁱ, 是一样的汉语“懈怠”的译语。翻阅《蕃汉合时掌中珠》和《同音》的话, 因为记录着 𣎵 𣎵 lon-lⁱ

①因为之后有不少这样的使用实例, 所以这不是衍字, 是新复原的方向指示接头词。见西田龙雄《西夏语研究的新领域》, 载《东方学》第一〇四辑, 2002 年出版。

②同第 99 页④。

究来说,其中涵盖了许多应该进行开拓的问题。

附记:

(1) 上文中把《华严经》的文体称之为单纯文体,尽管这只是拟汉文体,却代表着早期汉文直译体。相对此情况,《法华经》的复杂文体是在进入全盛时期反复推敲而来的文体,应该是能充分反映口语形式,丰富蕴涵着行为者视点文等的文体。这是西夏文字 1036 年公布以来,历经 30 多年时间西夏书面语所取得的显著发展。

(2) 此后,西夏文字公布,将囊括了西夏语设定以前各部族口语叫作党项语(党项羌语、西蕃语),可以认为西夏文字是一种能平等表记这些部族语图形

(上接第 97 页)可惜郭沫若见到这一抄本时,《管子集校》已经出版,不能再收入此本内容。陈奂墨宝堂《管子》抄本今藏上海图书馆。蔡潜道墨宝堂原本不知去向,此抄本为蔡本留一线之传,弥足珍贵。

墨宝堂本《管子》几经流传,最终竟不知去向,这是时代使然,也与聊城杨氏海源阁有直接关系。海源阁藏书,奠基于杨以增。道光末咸丰初,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当时江南诸家藏书多有散出,杨氏得以收取汪氏艺芸书舍以及鲍氏知不足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和杨湖孙星衍等名家旧藏。墨宝堂本《管子》就是在这一时期由艺芸书舍归入海源阁的。晚清至民国,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海源阁历经劫难。先有咸丰十一年(1861 年)捻军由皖入鲁,又有民国时期土匪李金发、王冠军前后攻陷聊城,海源阁藏书逐渐散失,杨氏家道不断衰落。至第四代主人杨敬夫,迫于生计,典卖藏书,墨宝堂本《管子》归入大连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当时由日本人掌控,后又被苏联红军接收,长期不在国人手中。墨宝堂本《管子》在被卖给大连图书馆时,就注定了其悲剧命运。海源阁僻处聊城,杨氏对藏书又深自密惜,不轻以示人,这使得少有人能获睹其珍本秘籍,更谈不上被影刻影印了。墨宝堂本《管子》不仅原本不知去向,而且也没能像杨忱本那样化身千百,现在仅有一抄本传世,令人叹惋。

[参考文献]

- [1] 巩曰国.《管子》杨忱本刊刻年代考辨[J].图书馆杂志,2003(3):73-75.
[2] (清)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M].北京:

的文字。(参照西田龙雄《亚洲古代文字的解读》中公文库 B7-20、2002‘付记’)

(3) 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花经》汉文原文和按日语序讲解的汉文是依据岩波文库出版坂本幸男、岩本裕翻译的《法华经》(上、中、下)。

[作者简介] 西田龙雄(1928—),男,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夏语言;景永时(1959—),男,甘肃古浪人,北方民族大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夏史;鲁忠慧(1965—),女,山西人,宁夏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伊斯兰文化。

[收稿日期] 2008-10-23 [责任编辑] 张京生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 [3] 中华书局.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0:481.
[4]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571.
[5] 王绍增,沙嘉孙.山东藏书家史略[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235.
[6] 林申清.郭沫若遗札及其《管子集校》[J].图书馆杂志,1999(3):40-41.
[7] 王绍曾,等.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Z].济南:齐鲁书社,2002:173.
[8] 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75.
[9] 潘景郑.著砚楼书跋[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70.

[作者简介] 巩曰国(1971—),男,山东大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与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收稿日期] 2008-02-10 [责任编辑] 张京生

